

随思录

# “到这个世上来总要留点痕迹”

张 弓

这句话是著名演员游本昌说的。

说起游本昌，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想起那句歌词：“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……”这是电视连续剧《济公》的主题歌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句唱词。游本昌今年已经84岁高龄，回算一下，他确实给社会留下了不少“痕迹”。195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到中央实验话剧院任演员之后，游本昌拍了很多电影和电视剧。1985年因主演电视剧《济公》一炮走红。1994年他创办北京本昌艺术传播中心，但并不顺利。2000年出演哑剧《游先生哑然一笑》。之后主演过电视剧《清明酒家》《宝莲灯》，自导自演电视剧《凡》。相继出演电影《剑雨》《见笑》《画皮2》……不久前，上海戏剧学院举行校庆，游本昌带着作品《弘一法师——最后之胜利》回到母校。耄耋之年的游本昌之所以还在演戏，想必是要实践自己说过的话：来到这个世上，总要留点痕迹。

游本昌的“痕迹”说，也是中国历代文学艺术界人士的追求。从古到今几千年，各朝各代的文人墨客，给我们留下的诗词歌赋、经典戏剧、著名小说，可以说汗牛充栋。这些鸿篇巨制，构成了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宝库，成了后人享用不尽的精神食粮。当然，并不是只有文学巨匠才能留下深深的“痕迹”，政界、军界、科技界等各界人士，也都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许多不凡的业绩，为后世所传颂。开明的皇帝，耿直的大臣，骁勇的武将，自然界不懈的探索者……他们的功勋同样彪炳史册。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社会精英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“痕迹”，后来者才能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不断推动社会前进。

古人说，“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”。不光是精英，大凡是人，会说话，能做事，来到世上走一遭，或大或小，或多或少，总会留下一点“痕迹”。古时的平民百姓，创造了浩如烟海的道德故事，如赵路亡羊、卧冰求鲤、苏秦刺股、孟母三

迁等等，都是古人馈赠给我们的美德与智慧。当代的工农商学兵，也是英雄辈出，他们那些脍炙人口的动人事迹，都在人们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激励我们向上、向善。就算是我辈等普通百姓，日常生活中的好言好语，也会给家人、邻居带来温暖；工作中的勤奋上进，也会给同事带去力量和信心；哪怕出去短暂旅游一回，你的文明言行，也肯定能让导游和管理者心生愉悦与轻松。

给后世多留下财富，少留下垃圾，应该是每个人的追求。来到世上，不能只坐享其成。在享受先人留下的“痕迹”时，也应尽量为后人留下有益的“财富”，至少别留下有害的“垃圾”。这样，在我们告别人世的时候，才不会感到羞愧和遗憾，才会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。社会也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自觉贡献而不断发展进步的。

有一位干了几十年的“老新闻”，在临近退休时，回首过去，悔恨以前没有努力工作，以至没有留下有点影响的作品，并告诫年轻人，不要像他那样虚度年华。他的人生悔悟应该能够惊醒一些还在“混混”的年轻人。我倒以为，即使年届花甲，这样的醒悟对自己同样是宝贵的，因为60岁为时还不算晚。近年来，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老年人做志愿者服务社会的事，总会心生感动。前不久，几家媒体差不多同时报道了宁波甬江街道的一位老人，他叫徐世利。徐世利出身贫苦，种过田，带领村民办过砖瓦厂。从2008年起，年过八旬的他，每天早上7点背着一个三四斤重的小包出门，坐公交车去火车站为行人指路。他的小包里放着不少东西：一支黑色水笔，几本公交手册、旅游指南，2叠空白小纸片，还有300多元从银行或报刊亭换来的硬币。纸片是给听不懂宁波话的游客写地名和路线的，硬币是给乘客换零钱用的。这样的事，他已经做了近10年，现在年近九旬，依然乐此不疲。人的水平有高低，能力有大小，身体有强弱，但只要真的想给社会留下点好的“痕迹”，机会满大街。

“痕迹”是中性词，既可以用来表达正面的“业绩”，也可以用于指代负面的“孽迹”。游本昌所说的“总

要留点痕迹”，自然是正面的。我们大多数人身后留下的“痕迹”，也是美好的占主流。但是不必忌讳，有些人来世上走了一遭，耗时可能还不少，却什么也没留下，到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枉来了一遭。更有少数位高权重者，他们最有条件为人民做些大好事，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，当然也最有机会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，给社会留下令人生厌的“孽迹”。近几年被揪出的一帮大小“老虎”，就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的人。他们制造的这些“孽迹”，污染社会环境，阻碍社会进步，理所当然受到舆论的讨伐，法律的制裁，也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很不光彩的一页，遭受后人的唾弃。不否认其中有些人为官伊始也曾想建功立业，造福百姓，但终究因为挡不住种种诱惑而坠入深渊，本来或许还企望着流芳百世，最后只落得个遗臭万年的悲惨下场。杭州西湖旁的岳庙立在那里有些年代了，它天天在警示着人们：人来到这个世上，究竟应该留下什么样的“痕迹”。

说法

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样的作品既能叫座又能叫好？说句真心话，现在做不到，是因为整个行业规矩很乱——电影大家都知道有假票房，因为身后有资本野蛮的进入，必须把票房做上去；这几年我很少独立完成一部电视剧，因为假收视率率力非常强，我做不了。换句话说人家也不理我，因为我在各种场合抨击假收视率。行业现在没有规矩。电视台看收视率的，和广告投放、厂家有直接的关系，假收视率厂家也看，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。

——知名演员张国立

农村经济活力提升的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“城归”。什么叫“城归”？城归是农村出去打工的农民经过了10年、20年，少的七八年，积累了经验，认识了朋友，有了点储蓄，更重要的是有了技术。农村又需要人，就干脆回来了。土地确权了，土地流转了，“城归”回来了，给农村带来了变化。所以，现在在中国发生一个新的情况，农民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，不是一种身份，而是一种职业。

——经济学家厉以宁

我们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也强调公检法之间的配合制约关系，但实践中更多体现为“以侦查为中心”，检察院和法院在证据审查采信认定事实方面严重依赖侦查机关，法院庭审功能发挥不充分，非法证据排除不足，罪疑从无原则贯彻不彻底。如果侦查机关“炒菜”质量不高，检察机关“上菜”难以把关，审判机关“吃菜”一定是“有苦难言”。因此，今后“做菜”必须更加精心细致，无论“选料备料”，还是“烹制”过程，都必须按照“吃菜人”认可的标准进行，否则就可能“退菜”。这也要求法院对于检察院起诉的案件，要敢于说“不”，对于公安机关做好、检察院端上来的菜，要有“退菜”的勇气。

——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、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

当家长“安排”孩子的意识过于强大，同时又缺少反思的话，家长会天然地认为自己的标准是正确的，而且会认为它是孩子所需要的，结果把孩子引上了与自己初衷相反的道路。像有个家长给孩子买了不少绘本，但是儿子偏偏不愿意看，更喜欢玩iPad。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只要儿子好好读绘本，就让他玩两分钟iPad。果然，儿子就乖乖地把绘本看完了。但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用iPad去奖励孩子的时候，给孩子传递的信息是：如果我做了一件没什么意思的事，就可以被奖励做更有意思的事。跟读书相比，玩iPad这件事情更有意思。这是非常可怕的，当孩子有一天突然没有了父母的约束，他为什么不跳过前边没意思的事情，直接到达最后一个目标呢？

——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

数字

## 超千亿元

——《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》显示，2015年，我国境内接受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共计1108.57亿元，较2014年增长66.31亿元，创历史新高。其中，货币及有价证券捐赠占76.2%，物资捐赠折价金额占23.8%。

## 10773名

——目前，中国作协个人会员人数首次过万，达到10773名。中国作协新发展的会员中，45岁以下占40%、女性占27%、少数民族占13%、网络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等新兴文学群体占13%。

## 40917块

—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透露，截至12月20日，全国银幕已达40917块，平均每天新增26块银幕，与去年日均新增22块银幕相比再次提速。中国银幕总数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。

老话新聊

## 船到桥门自会直？

桂晓燕

老宁波知道，宁波老城区内的街道，原来几乎都是沿河而筑，自民国年间开始逐年填河，拓宽道路，才慢慢形成了现在的格局。当年城里河网纵横，桥梁林立，河上小船穿梭，桨声回荡。河多桥多船多，就产生了一句老话——“船到桥门自会直”。意思是：不管船的姿势是歪是斜，一摇到桥门洞面前，自然就会变直，顺顺当当就过去了。

这句话，一些“自做馒头白”（可惜“咬开纯大麦”）的阿妈（母亲）们最喜欢讲了。当她们的宝贝孩子在学校里恶作剧欺负同学时，她们往往轻描淡写地这样说：“船到桥门自会直！”意思无非是：阿拉儿子（女儿）现在还小咧！等其大起来，自然会变好！

这些阿妈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宁波老话是有一句“船到桥门自会直”，但下面还有一句“勿是碰，就是别”！意思也很清楚：船儿如果不端正船头方向，那么到了桥门洞面前，是一定会碰得鼻青眼肿的。同样道理，如果孩子从小横蛮无理，不走正道，长大后也一定会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。

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：当年李双江老来得子，宠溺无比，儿子李天一成了蛮不讲理、为所欲为的小霸王。三四岁时，李天一同爸爸吵架，居然对他爸又踢又打。朋友批评李双江，你怎么能容许他这样？李双江却说：“小孩子不懂事。”潜台词就是：“等他长大后就懂事了。”李双江的这句话，是不是和“船到桥门自会直”很相像啊？那么，李天一长大后有没有懂事呢？很可惜，不但没懂事，还干了不少丑事，结果把自己送进了监狱！这就是“碰”和“别”，碰得好重，别得好痛！

许多人骂李天一“坑爹”，笔者倒认为，其实是李天一先被“爹坑”，然后再“坑爹”。岂不闻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的至理名言？

可以说，像李天一这样的小霸王，远未绝迹。最近，屡屡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，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。2016年，全国仅经媒体报道的影响较大的校园暴力事件，就有87起。有多人围殴一人的，有用烟头烫别人身体的，有撕掉对方衣服拍摄视频晒到网上的，还有威逼同学吃屎喝尿的……不少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！

校园暴力折射了社会问题尤其是家庭教育问题。一方面，不少有暴力倾向的孩子，其父母在家中也经常对他们施行“男子单打”、“女子单打”或“男女混合双打”，使孩子误以为暴力代表权威，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方法；另一方面，未成年人的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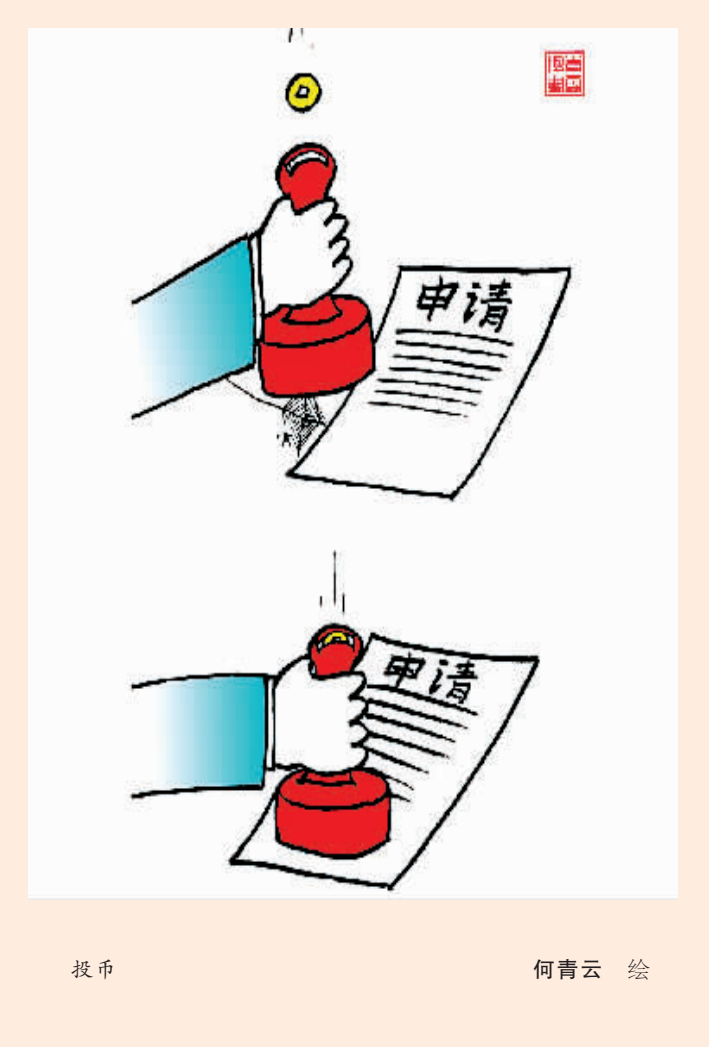
力事件，有些还是成人社会权势地位的“投射”。一些“我爹是李刚”式的孩子，敢于向父母是弱势群体的同学施暴，这种肆无忌惮的不平等，更容易给被辱孩子的心灵造成巨大创伤；再一方面，孩子之间的矛盾，会由于某些家长“咬奶头”，偏袒自家子女，而演变成家长之间的争斗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与此同时，由于应试教育压力大，学校普遍重视学习成绩，道德教育不到位，使一些学生缺乏基本的爱心和公德，成为霸凌事件的施暴者。

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，霸凌事件发生后，施暴者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，无形中长了施暴者的威风，灭了受害者的志气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不妨学一学美国。美国最重要的经验是，反校园霸凌有强大的法律支撑。全美50个州都设立了反霸凌法，对严重的霸凌行为定义为犯罪，该关的关，该罚的罚，真正实现了对校园霸凌行为的零容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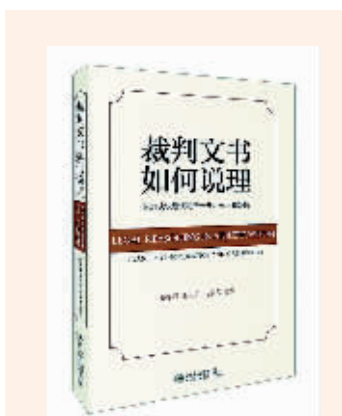
校园霸凌对受害学生身体、心理上的影响，远远超过想象，遏制校园霸凌刻不容缓。学生个人、家庭、学校、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全社会，都应该重视起来。船到桥门是不是能顺利通过，要看船头是不是正，船身是不是直；孩子能不能健康成长，也要看环境是不是好，教育是不是严。

漫画角



社科书架

## 以判决说理促进司法公开、公正和公信



《裁判文书如何说理》  
王利明 孙华璞 马来客 著  
2016年12月

裁判文书作为司法活动的最终产品，是司法公开的主要内容，也是彰显司法公正的重要载体。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之下，裁判文书的质量优劣更是关系着司法公信力能否重建。本书作者王利明是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副校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全书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，论证了提高裁判文书说理性对推进司法公开、促进司法公正公信的重要意义。

王利明

2013年，我与时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孙华璞院长、时任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马来客院长，共同牵头承担了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司法调研重大课题《关于深入推进司法公开、促进司法公正、公信问题的调研——以判决说理促司法公开、公正和公信》。课题组组成通力合作，围绕“以判决说理促司法公开、公正和公信”这一中心议题，展开了系统的实践调研和理论分析，并完成了《裁判文书如何说理》一书。

该书首先对裁判文书说理的概念与功能进行了系统论述，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域外经验、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，然后以大量真实的案例和文书，系统说明了优秀裁判文书的说理结构和内容。该书结合审判实践经验，就我国当前司法审判在诉讼程序、证据采信、事实认定、法律解释与适用等各个领域的说理现状和改进方案作了详细阐述。该书还就制约法官判决说理的知识和体制障碍作了系统梳理，并提出了应对这些障碍的方案，包括实行判决书个人签名制等实验性和创造性方案。最后，本课题组根据实践调研和理论研究编纂了《关于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（建议稿）》，以供改革决策参

考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人遇事都强调要有一个“说法”，也就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解释理由。在现代法治社会的组织和生活方式中，司法裁判无疑是社会大众寻求公平正义的核心渠道。裁判文书说理是判决结论合法化、正当化的重要载体，更是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具体体现。

俗话说：“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”司法的固有特性决定了法院应该是最讲逻辑、最讲道理的地方。人民群众之所以将纠纷提交到法院，正是为了寻找说理的地方，求得一个有理的解决方案。如果判决书不讲道理，就意味着司法不讲道理，老百姓也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说理了。这也正如法谚所云：正义是从裁判中发声的。司法的正义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具体的，它正是通过每一份判决书中的理由所彰显出来的。可以说，判决的说理性越强，其公正性越强，也就越容易被当事人所接受，从而发挥其案结事了和秩序塑造的作用。在实践中，一些判决虽然在结果上对各方当事人作出了公平合理的处理，但因为欠缺说理，导致一方或双方都不相信该判决是公正的，甚至出现无休止的缠讼、上访，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，这也从整体上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。

其实，我国自古就有讲求判决说理的传统。古代裁判官并非不少人想象的那样专断专横，相反，自西周开始，历朝历代都不乏充分说理的判词。例如，早在西周晚期就出现了关于刑事案件的完整判词，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对犯罪事实的认定、定罪量刑的理由以及对判决执行的要求。从秦朝的比附援引、依律定罪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，从唐宋时期以事实为依据、援引律例制作判词，到清代判词中开始出现专门说理的段落，再到民国时期将判词分为正文、事实、理由三部分，许多朝代的判词都十分注重天理、国法和人情的结合，判词中经常引用典故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明之以法。有的判词十分讲究推理，注重逻辑，甚至十分注重判词说理的文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高度重视司法判决的说理工作。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任院长谢觉哉就曾强调：“法院是评论道理的地方，犯罪分子怕他，因为他讲道理，没理的逃不过去……人民爱护法院，首先在于法院深通道理探明法律，站得住脚。”

“以判决说理促司法公开、公正和公信”是一项系统的司法改革工程，需要审判实践部门和法学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与协作。希望本书能够为我国司法改革和学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

（本文为著者王利明所写，有删改）



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本书收录了作者近40年来的研究成果，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治理、国有企业的权威问题、制度变迁下的社区权力与秩序等问题，进行了深入探析。



本书采用经济史与企业史交叉进行的方式，全面解读中国企业百年间的生存、发展、困局与解决之道。通过海量经济数据资料，量化不同时期政策、环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；同时，通过时间纵向与空间横向穿插比较，立体展现中国社会风貌。

（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）